

列 宁

社会民主党  
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第二分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本书譯文采自“列寧全集”中文版第9卷，  
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由譯者根据原文又重  
新作了一次校訂。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10  $\frac{1}{4}$  • 字数 89,000  
1964年7月北京第1版  
1964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56 定价（二册共）（五）1.30元

##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會議沒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許起义而不容許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謬得太刺眼了。因此，決議就給馬尔丁諾夫和馬尔托夫对問題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們来看看決議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終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說，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說，在原則上不仅容許从下面，而且容許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說，爾·馬尔托夫发表于“火星报”上(第93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論点是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并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是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只是局部、暂时等等的夺取)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

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起义，如该决议第一段中所说的那样，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sup>19</sup>，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给它一个什么名称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外来的和“新的”字眼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像彼得堡这样发生过一月九日事件的地方不也

是一個“城市”嗎？像高加索這樣比許多國家都大的地方不也是一个地區嗎？如何對待監獄、警察局和國庫等等等的問題（這些會使新“火星報”為難的問題），甚至在一個城市里，更不用說在一個地區，在“奪取政權”的時候，不是也會擺在我們面前嗎？當然，誰也不會否認，在力量不足，起義不能完全成功的時候，在起義得不到徹底勝利的時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臨時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們，這和問題有什么關係呢？你們不是在決議中一开头就說到“革命的徹底勝利”和“勝利的人民起義”嗎？？從什麼時候起社會民主黨人把無政府主義者的事情攬到自己身上來，去分散無產階級的注意力和目標，去引導它作“局部的”鬥爭，而不作普遍、統一、完整和全面的鬥爭呢？既然你們自己提到在一個城市里“奪取政權”時是說為了“使起義擴大”，那末我們是否可以大膽地設想是為了擴大到另一個城市中去呢？我們是否可以大膽地希望是為了擴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們，你們的結論和你們的前提一樣地靠不住，一樣地偶然，一樣地矛盾，一樣地糊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對一般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給了一個詳盡而明白的回答。這個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臨時政府也包括在內的。代表會議的回答則勉強地任意地把問題的**一部分**劃分出來，結果只是**逃避**（但沒有成功）整個問題而弄得一团糟。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這個概念和“臨時革命

政府”有區別嗎？如果有，那末區別在那裡呢？代表會議派先生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思想是混亂不清的，結果就——這是很常見的事——盡說**革命的空話**。的確，社會民主黨代表的決議中使用“革命公社”這樣的字眼，不過是說革命的空話而已。馬克思屢次斥責過這種用**早已過時的**“動聽的”名詞來遮蓋將來的任務的空話。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動聽的名詞，在這種情形下就會變成空洞而有害的華而不實的東西，變成裝飾品。我們必須向工人和全體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說明：**為什麼**我們要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如果在將來，在已經開始的人民起義得到勝利的結局而我們對政權有了決定性的影响時，我們**究竟要實現一些什么样的改革**？這就是擺在政治領導者面前的問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十分明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提出了關於這些改革的完備的綱領，即我們黨的最低綱領。而“公社”這個字眼卻沒有給予任何回答，只是用遙遠的響聲……或毫無內容的高調來搅亂人們的頭腦罷了。我們愈珍視例如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許不分析它的種種錯誤和特殊條件而引用它來敷衍了事。這樣做就是重複布朗基派（在他們的 1874 年的“宣言”中）崇拜公社的每一個行動而被恩格斯譏笑過的那種錯誤<sup>20</sup>。如果有工人向代表會議派問到決議中提到的這個“革命公社”，代表會議派將怎樣回答呢？他們

只能說，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爭取共和制的任务和爭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不能解决向凡尔賽实行坚决的軍事进攻的任务，犯过不占领法兰西銀行的錯誤，等等。总而言之，你們在回答这个問題时，无论援引巴黎公社或者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們一定要說：**这就是我們的政府所不应当模仿的**那个政府。不用說，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綱領，不适当地在決議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表明书呆子的說教和革命者的軟弱无能嗎？难道这不是恰好表明你們不成功地竭力归之于我們的那种錯誤，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沒有把两者辨別清楚）的錯誤么？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說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謬理論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又是眼光短浅和态度輕率。“革命公社”，即甚至是以一个城市为限的革命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暫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閉眼不看这个問題，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必定要以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費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員会，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实行許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結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

新火星派決議的結尾部分虽然沒有供給我們什么新材料来批判在我們黨內复活了的“經濟主义”的原則趨向，但是它从多少有点不同的角度証实了上面所說的話。

下面就是決議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經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新旧交替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最好地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会落(??)到它手里來的話。”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說过，我們不应当害怕(像馬尔丁諾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們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

級擺脫了資產階級的桎梏，就會反過來幫助我們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但是請你們看看，這個思想經過新火星派的敘述竟被糟蹋到什麼地步。我們不談那些細節問題，例如荒唐地假定政權可能“落”到一個把奪取政權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覺的政黨手里來，我們也不談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不是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而是根本已經成熟；也不談我們的黨綱根本不知道什麼社會主義改革，而只知道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現在只把“前進報”的思想和代表會議決議的思想之間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拿來說說。“前進報”向俄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指出了積極的任務：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並且利用這個勝利來把革命傳布到歐洲。決議却不懂得我們的“徹底勝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謂的“徹底勝利”）和歐洲革命之間的這種聯繫，因而就不提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提**無產階級**勝利的前途，而是談一般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時候”。“前進報”估計到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可以立刻實現什麼，必須首先實現什麼，以作為爭取社會主義的民主前提，從而直接而明確地指出（而且指出的這些話已經載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可以怎樣和應當怎樣“利用政府權力”來謀取無產階級的利益。決議在這裡也不可救藥地做了事變的尾巴，說“能夠準備去利用”，但是說不出怎樣能夠，怎樣準備，怎樣利用。譬如說，我們不懷疑新火星派“能够

准备去利用”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問題在于他們对这种利用的嘗試和他們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叙述道，实际“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可能”，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这两个阶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在这里，代表會議的決議也沒有提供絲毫肯定的东西，而只是逃避問題。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肯定地应当决定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决定于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間还有相当的距离）肯定地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拚命抵抗，——新火星派的決議沒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則估計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除无产阶级以外，我們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爭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末“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沒有希望的，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們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目的不只是**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是**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

限的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們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問題上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这并不等于在民主主义問題上和爭取共和制的斗争中也沒有意志的统一。忘記这一点，就是忘記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邏輯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記这一点，就是忘記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談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間的意志的统一。它們之間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爭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sup>①</sup>。那时，我們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織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絲毫不妨碍我們从邏輯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們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們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嗎？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沒有許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嗎？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許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嗎？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記，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須是一个单独存

---

① 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击溃得愈快，这种统一性就结束得愈快。

在的、階級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們和資产阶级“一起打”的行动就带有暫时的性质，我們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監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絲毫不能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忽略或輕視那些就現在來說是迫切的、那怕只是暫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暫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輕視，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暫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簡直是反动了。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沒有在綱領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問題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問題分开（虽然在德国問題上，恩格斯在評論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輕視共和制和爭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sup>21</sup>）。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綱領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問題，因为我们这里談不到共和制問題和社会主义問題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問題当做首要問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

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 1848 年不提共和制問題，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旦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详细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 附注<sup>22</sup>

(一) 請讀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論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了这位意大利(后来的)改良主义者領袖，叫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sup>23</sup>。恩格斯在 1894 年論到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火星报”責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則。这种責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說来，“前进报”(第 14 号)<sup>①</sup>完全承认馬克思把十九世紀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清的理論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論，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一)自由派

① 见“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8 卷第 247—262 頁。——編者注

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第一种力量不过是为君主立宪而斗争，第二种力量是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第三种力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 大会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 某些決議的一个粗略的比較

临时革命政府問題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策略問題的中心。十分詳細地分析代表會議其余各个決議，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我們仅限于簡略地指出几点，來証实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

會決議的策略方向和代表會議決議的策略方向之間的原則區別。

就拿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問題來說吧。你們將再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找到这个問題的完整的答案。这个決議估計到特殊时机的一切复杂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虛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最后，要回击黑帮。在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問題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回击黑暗反动势力”一事只是在关于如何对待其他政党这一問題的決議的理由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問題，是和沙皇制度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問題分开考察的。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用标有“关于經濟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单独的決議来重复（在說了一堆关于“工人問題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話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謂“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口号现在显得不够和落后，是一望而知，无須証明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問題。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計到我們的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事情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事情，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經不能不考虑公开活动的問題。必須立刻为这种活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

而也就必須為此目的來準備下特別的機關——秘密程度較少的機關。必須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團，使它們尽可能變為俄國將來的公開的社會民主工黨的據點。

代表會議在這裡也把問題弄得七零八碎，沒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號。特別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託組織委員會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決定“使那些以協助工人運動為目的的民主報紙服從自己的影響”，這是十分荒謬的。我國所有一切合法的自由派報紙（按方向來說幾乎全是以“解放派”的報紙）都是以此為目的的。為什麼“火星報”編輯部自己不開始執行它的這個忠告，給我們作出一個使“解放”雜誌服從於社會民主黨影響的榜樣呢？他們給予我們的並不是利用合法的社團來建立黨的據點的口號，而是：第一、僅僅關於“職業”工會的私下提出的建議（黨員必須參加這些工會），第二、對“革命的工人組織”＝“無定形的組織”＝“革命的工人俱樂部”進行領導的建議。“俱樂部”怎樣成了無定形的組織，這些“俱樂部”究竟是什麼東西，只有上帝才知道。這不是黨的最高機關的明確的指令，而是些著作家的雜感和隨筆。關於黨應當怎樣開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轉到全新的基礎上的問題，根本沒有任何完整的說明。

關於“農民問題”，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來的。代表大會制定了“對農民運動的態度”的決議。代表會議制定了“在農民中的工作”的決